

一九八四年第一輯（总第十三輯）

新會文史資料選輯

新會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組



VB 411117

1988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一九八四年第一辑)

4H127114

新会县政协文史资料工作组编

1984年2月



校內編修：黃一良

校內付印：李江

新會文史資料選輯

1984年第1輯

一九八四年一月出版

非賣品 請交還

新会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三辑

目 录

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陈占标（1）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霍佰白（4）

荷塘人民团结抗日战斗的经过…容顺棠（7）

新鹤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前前后后

情况的回忆（四）……谢 悦（25）

我在新会天亭当县长的一年……林仲葵（32）

三江龙泉械斗的前因……林达天（39）

新会县第一位西医师——余献之

……县政协文史采访组（40）

我县的“贡橙”……梁 旺（43）

民国时代古兜山贼的兴灭……彭秋萍（44）

我做羊牯十一天……冯 满口述（52）

回忆九个月羊牯的悲惨生活

……陈拱南口述（55）

同盟会新会籍成员胡少翰简历订正

……政协文史组（60）

读者·作者·编者

……质疑·补充·订正·（63）

（封面说明：梁启超手札墨宝）

梁启超家庭出身的调查材料

陈占标整理

清末维新运动主将之一梁启超的家世，在丁文江主编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一些记载。但是，文字简略，没有系统的叙述；特别是有关家庭经济情况，笔墨尤鲜。以后出版梁启超的史、传文献，对于其家庭出身，也说法不一：一般的说法是“出身小地主家庭”①也有说梁启超“生在一个大乡绅的家庭里。”②这些说法是否符合实际，值得探索。现将我们在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环城区茶坑村调查所得整理如下，以供史家和学者研究参考。

梁启超于清同治十二年癸酉（公元一八七三年）正月二十六日出生于茶坑村。那时茶坑属寿宁乡的潮居都管辖。村里共有四里，曰大井、曰嘉亨、曰鞞马、曰南兴，梁启超的家就在嘉亨里。自先祖于明代天启年间（一六二一——一六二七年）定居茶坑，传至启超，已经有十五代了。茶坑村位处青胆洋出海口，当西江下游与潭江汇合入海之冲，在清初康熙年间编的《新会县志》里，也有熊子山（茶坑村后的凤山）是四面环海的大岛的记载。因当地的土地结构是冲积层平原，田土逐步扩大。村中居民有垦自填自田而开发耕地，北的一面，逐渐与城郊联成一片。直到清末（同治、光绪间）耕地的大部分仍为各家农户私有，剩下的少部分便是“祖尝”公有田。这些尝田，分别租给族中人多田少的子孙耕种，管理“祖尝”的人，一般是比较富裕的户头；梁启超的祖父和父亲都没有管过“祖尝”，可见其家并不入富裕之列。

梁启超的祖辈世代务农，自耕自食。到了他祖父梁延后成为村里第一个秀才之后，仍以耕耘为生。梁延后原先从祖辈分得几亩田，在他中了秀才之后，利用公赏奖励的“封包”钱置了十多亩田，合起来约有二十亩左右，分给三个儿子，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才分得六、七亩田，③全部自耕自种，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直到清光绪十五年己丑（公元一八八九年）启超中举后，莲涧外出教师，才以帮工的形式把田委给同姓兄弟代耕，这属互助性质，算不上雇工剥削。茶坑是属于经济作物地区，那时候的种植面积分配大致是：稻田占五成、柑田占三成、葵田占二成。莲涧所有的六、七亩田，耕种稻谷的不过三、四亩，收入有限，除了靠柑果收入（每年约有三、四十担柑果）之外，还要靠教书所得（一般有三十个学生，每人交三至五元不等的学费，年中约收一百元左右）来补充家庭生活。根据以上情况，梁启超少年时的家庭经济，在乡中属于中等水平，今天的乡老认为：如果划阶级，那时也只能算作中农之列。又据梁启雄的夫人于数月前忆述：启超少时，祖父延后公爱其聪慧，又是长孙，爱上加爱。有一次吃饭，蒸有一只鸡旦，祖父就把鸡旦给了启超。启超不愿独吃，就分了一半给二弟启勋，又把剩下的蛋分给其他弟弟吃。从这段生活插曲里，可以看见过着清茶淡饭的生活了。

梁启超的家庭政治地位的情况是这样：祖父梁延后虽中了秀才，但他没有去当教谕，而宁愿在乡间执教鞭，可见他的恬淡的性格。从他的毕生行为来看，可以说是一个乐善好施的人。他虽曾倡设“保良会”出发点是为了乡村的安宁，并没有发生欺压群众以至杀戮的事件。那时候的茶坑村，是经常受到强邻欺侮的：有一年，茶坑三堡庙做戏，邻村天马

乡的人撑旧船来看戏，临走时，却把茶坑的新船撑走，对此，茶坑人毫无办法，没能把自己的新船找回来。梁延后谙熟医理，平时替乡人诊病，从不计较诊金；有时还施医赠药，给贫苦的病者以帮助。他看见村中道路失修，便倡修村路，把节俭来的钱捐献出来。因而，他受到乡人的爱戴。梁启超的父亲梁莲涧，早年屡试不第，便绝意仕途，过着舌耕生活；后来梁启超有了政治地位，莲涧虽然当上乡绅，但他能继承父风，专以排难解纷为己任。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梁启超的家庭政治地位，是称不上有权有势的。

注①例如1956年出版的胡滨著：《戊戌变法》和1980年出版的孟祥才著：《梁启超传》。

注②见《民国人物传》第二卷 耿云志：《梁启超》。

注③据去年访问梁启超之弟妇（启雄夫人）口述：延后老太爷分给莲涧二十亩，莲涧修建故居时不够钱用，卖去几亩田。对此说有存疑，姑附记于此。

注④1854年（咸丰四年）陈开、李文茂红巾兵起义围攻广州，新会陈松年、吕萃晋起兵响应围攻会城。清政府调动大军镇压，事平之后，飭令县成立“保良局”各乡跟着先后成立“保良会”。此后“保良会”便成处理乡事的机构。其人选由各乡推选有功名或老年人士担任。茶坑在地理上西邻天马东南邻三江，均族大人多。该乡的“保良会”的组织，只是熊子塔山下的四个自然村。

附记：

以上调查材料，是综合下述各次调查所得整理写成的：

（一）一九五九年间，修志会客忍之、李朝汉、麦炳昆及佳木访问茶坑调查材料；

（二）一九八三年七月，访问北京的梁启超后裔调查材

料，访问人：薛剑虹。

（三）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访问茶坑，参加座谈会的老人有：八十五岁的梁兰犹，七十九岁的梁亮犹，七十八岁的梁自宜、七十六岁的梁昌犹。等老人口述，前往访问的人员是：张利生、薛剑虹、何卓坚、伦海滨、叶发琼、陈占标。

（四）一九八三年八月中旬，再次访问茶坑，前往访问者为叶发琼，被访问的老人有梁亮犹、梁乾等。

梁任公先生印象记

——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

霍 偈 白

编者按：霍坚，字偈白，南海县人，一九三〇年四月至同年十二月期间曾任新会县长。

此文写于一九四九年元月，原载上海《时事新闻》第十一期。《时事新闻》编者附言：“闻北平‘任公学会’拟届时发刊纪念论文集。”

《印象记》中亦有提及任公晚年之生活及亟无意参加政治与乎民社党酝酿之经过，诚难得之史料也”。任公、偈白两人，均与我县历史有关，故今特为转载，以存史料。霍的近况不详。

忆幼时入塾，常闻诸师友及父执谈论戊戌政变始末，并及任公先生之为人，往往称羨不置。不禁心焉向往。弱冠游学沪滨，适值先生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

偶于乡前辈冯挺之先生席上一遇之，初见平易无异常人。次日复于吴野人先生（即我佛山人）座上再瞻丰采，野人先生固淳于髡之流，多方为余俞扬，并谓是君虽少，曾居印度有年，深知印度国情，熟谙梵文等语。实则余虽曾随父执旅印三年，略操印度流行语，他非所习也。先生视余在座上腴腴不多言。遂舍众客侧席独与余谈，询余英人治印及印回两族龌龊情形甚详，什九皆余所不解答。窃叹先生不耻下问与乎奖掖后学之深心，决非时贤所能比拟。由是益心仪其人，而喜读其文，顾是时立宪论与革命论激战甚烈，先生曩亦醉心革命之志，其所著《饮冰室自由书》，颇富革命思想。然自游新大陆归，宗旨顿改，盖默察彼邦民性风格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皆远非吾国国民所及也。时人以是先生病，虽余亦不免多少受众论影响。迨民国五年，余自日本毕业返国，承同学李守常（大钊）之介，追随薪水汤公济武服务众议院，汤公素服膺先生，休沐之余，辄好为余盛称先生学问之渊博及政治之勤与乎诲人不倦诸美德，余深志之。会先生自津门入旧京，参众两院议员假虎坊桥湖广会馆开会欢迎，盖自袁项城密谋称帝，先生即避居天津，有所策划。旋复因赞助蔡松坡将军兴兵讨袁，间关密走滇南及百越，屡历险阻。至共和再造，乃得重登旧都也。是日汤公代表致欢迎辞毕，先生演说，所以奖诱同人，泯除党见，努力从事制宪者，无微不至，历二小时无倦容。其态度之诚恳，措词之精辟，虽平军反对先生者，至此亦莫不倾心折节，肃然起敬。翌年而督素因之难作，段祺瑞被黎元洪免去国务院总理兼陆军总长职，众议院亦遭解散。汤公知大局不能挽回，乃预先辞去议长职务，欲以布衣之身提供政见，以备当局参考。不图安徽督军张勋煽动督军团拥戴溥仪复辟，先生乃与汤公相约，力劝

段祺瑞兴兵讨逆。段氏复出，即世传马厂誓师之役也。是役，余以追随汤公故，寄寓汤公津门旅邸月余，暇辄随汤公往访先生，以是受益之机会较多。越二年，先生游欧归，鉴于我国学术远不逮人，乃发起组织共学社及读书俱乐部，使蒋百里先生主其事而命余为之助。诸事稍稍就绪，余又随刘子楷公使葡萄牙使馆供职，到期返国，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适先生为该校董事长兼校长，因事弗克南下，乃先后聘陈筑山、张东荪两先生相继为学长，代理校长职责。遇有大事，则派余为代表赴天津就商于先生，于是复得时时亲炙其言论丰采。十四年秋，余应江型云（庸）先生之聘，继石志泉先生任国立北京法政大学教务长，寄寓松树胡同新月社，会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特别讲座，每逢星期六下午入城，至友蹇季常、林宰平、徐志摩诸先生发起聚餐会，遇先生入城之日，辄轮流作东道主。余参加盛会，先生于退食之余，辄好为余等复述其一周间读书讲学之心得，津津详道。余等倾耳谛听，若立雪程门焉，余之离中公而就聘于法大，原为就近北京教育部以便办理中公立案手续。手续既妥，余于十五年秋仍回吴淞中国公学授课兼任教务长职。未几，北伐军进至京沪，上海市党部派何鲁强制接收中国公学，以世传先生及董事长熊希龄先生等皆所谓研究系领袖也。余代表先生办理移交毕，挈眷赴沪，寄寓张东荪学长家。当是时，张东荪及张君勱两先生方痛恨一党专政之不当，欲组织在野党以相对峙。乃公推余为代表赴旧京力请先生出任党魁。先生方在协和施行手术之后，夙病新痊，闭门静养。间或潜心著述，不复与闻政治，遂再三告余曰：余自少抱改革政治决心，力与愿违，愧无成就，请为我寄语东荪、君勱两公曰：“余决不消极，唯不愿用重以所短以自缚耳”居有顷，余南下复命。

颢行，先生复寓书重述此旨。此为余待教之最末一次。后二年，余在广州闻得先生病歿旧京，追念前缘，弥增凄怆。越一年，余随颜自清远调掌新会县县篆，公余结伴赴崖门吊古，路过先生故乡茶坑，其他峰峦奇俊，树木苍郁。盖自县城圭峰山蜿蜒数百里，蔚为壮观。想见先生(生)平钓游读书之乐，然后知钟灵毓秀，其来有自也。世之未识先生者，或对之为贤者之责备。盖处过渡时代，中西新旧之辩，已不胜其诤聒，而同一不龟手之药，或以霸，或不免于泮泮统，先生于取舍选择之间，岂敢自谓千虑而无一失？然终生追求真理，至死不倦，每与人析疑问难，辄虚怀若谷，得一善，必拳拳服膺，即以此种精神，求诸晚近学术界中，已罕有其匹，而其对新文化启迪之功尤不可抹杀。又况先生学问道德，彪炳史册，所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岂予小子所能称述其万一？至先生自谓于政治无所成就，然屡次恢复共和，功在民国，其成就不亦伟哉？兹值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特将余与先生遇合始末，略述梗概，聊志景仰云尔。

中华民国三十八年元月十六日南海霍坚谨识。

荷塘人民团结抗日战斗的经过

容 顺 棠

我们荷塘人民抗日战斗的英勇事迹，是我少年时代发生的事，于父兄口中虽常有所闻。但有许多内幕情况，殊不了解，也未去深究。今承县政协文史组同志嘱我就地向当时有关人士探访，撰写史料。但荷塘是封建氏族矛盾较深、各方面的政治、经济、地理环境也极为复杂的地区，如何在敌人

侵犯的时候，却出现了共同抗战事迹？为要说清楚这一些问题，就得从多方面进行采访。这篇是我向多位身与其事的人采访记录整理出来的，并希发表之后，得到更多的知情人的指教予以补充订正。

一、抗日前荷塘社会的概况

荷塘公社在我县的东北，是西江下游的岛屿，四周环江，西为棠下，南为潮莲，东北为顺德的江尾（今均安公社），东南为中山县之古镇，毗邻两县，与江门北宁和外海遥遥一水相通。江深海阔，河汉纵横，而又当着广州与四邑、中山及出海交通要冲，历来是“海盗”出没之区。

在1958年建立公社以前，荷塘这个岛，约有五分之二自然村，是归顺德县属。行政区域这么划分，并不是由于地理上有什么自然的分界线。而是从1452年（明、景泰三年）因黄萧养称王海上，事平之后，明朝廷建立顺德县时，为了防范“海盗”，于是割新会的白藤堡归顺德县治管辖，从而使“掘尾海”南北两岸之地都归顺德县属，（“掘尾海”是西江出海的一条支流，位于现顺德均安区和 新会 荷塘区之间，）以利政治、军事的管理、指挥、防范“民变”。然而在抗日战争之前，并没有因为地理上的划分，“海盗”便能绝迹，“其中盗贼出没之处，如猪头山，篁湾冲口，良村冲口，海洲河（当地人称海洲迳）口，蟠江渡头”。（清道光《新会县志、林志》卷一）都是防不胜防，比剿彼窜，治安殊少宁日。远的不必说，近如一九二五——二六年间的胡佳、李新、容沃桓就是盘踞荷塘的土匪头目。抗战期间的大天二，如李桂元、容二、容亦伦（绰号发疯仔扁）、李厚、容沃桓、李伯元、高二、龙琼、大炮兴等先后出现，其势力

遍布各村。

正因为人为地把这个小岛划分两县统治，同时增加了岛内乡民种种的矛盾。本来这里各个自然村的氏族封建矛盾已是复什，其中有容、李两大姓，此外还有胡、刘、陈、黎、黄、朱、周、高、俞、聂、冯、吴、梁、徐、余等十多姓，有的一村聚族而居，有的一村内二、三姓，小姓的只有几十人，大姓如良村容氏有五千多人，篁湾李氏有二千多人，其它各村各姓千百人不等。抗日前荷塘区统计人口约有万余。在封建社会中，氏族械斗，是常有的事。近几十年来，容李两姓的大械斗，就发生过两次，清末发生过一次，一九二六年又发生过一次，每次械斗不止两姓而已，各自互相串联，容姓则仗着人多、勇士多，纠合了黎、胡、余、黄等姓结成联盟。李姓则恃着公尝多、官宦多、纠合了刘、高、陈等姓结成联盟，互相斗杀，他们并不为县界所限。又如一九二二年，顺德县属高村的高姓和新会县属三丫的黎姓，两村比邻，也发生了一次大械斗，他们也本着过去的容李械斗结成的氏族联盟，分别互相支援、斗杀。象如此错综复什，地理上此疆彼界，氏族间怨仇深积的地区，怎能消除积怨，共同对敌，这是当时开展抗日宣传运动的重大难题。

为了共同抗日，首先要有共同抗日的意志，但是荷塘当时的上层人物，早已受到国民党的亲日派失败主义的影响，散播抗战必亡言论。大家知道后来成为大汉奸，汪伪政府首脑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就是荷塘太通里人，汪氏俱内，陈氏是可以左右汪氏行动的人，汪氏死后，陈氏回来广东，成为广东伪府的幕后操纵者。陈家虽是泰国华侨，但她的亲戚故旧在荷塘的人不少，如伪府南京警备司令李馥一，是荷塘篁湾人，在伪府未成立以前，他用的李启颐名，当范德星为

主任的广东第一区民众抗日统率委员会和范德星第四战区第五游击司令的参谋长。李范两人后来都当了汉奸，李的弟弟李拜言在乡有一定势力，同村兄弟李荫棠在新会汪伪县府也当了主任秘书。良村的容育之、篁湾的李拜言在日伪包底下在江门搞了一间鸦片专卖的福隆公司。江会沦陷前当民众抗日自卫队新会县第四大队大队长的容骏林也投靠广东大汉奸“市桥皇帝”伪四十四师师长李朗鸡门下当了参谋长。这些人在江会未沦陷前，象患麻疯人一样，或一时未出面，但麻疯菌早曾混身潜伏了，他们的社会地位和言行往往影响到荷塘的一部份人。

二、群众抗日团体及地方武装机构

一九三七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随着抗日战争在全国展开，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日的旗帜下，纷纷组织宣传团体，新会荷塘也象各地一样。当新会县国民党部成立“新会民众抗日后援会”后，同时在各乡发展组织，荷塘良村的容仲博、容泰（后来当了土匪头）、容汉光以觉觉音乐社的成员为基础，在乡成立“新会民众抗日后援会荷塘分会”。招牌挂于西良定谷祖祠，它的主要活动是用古装粤剧和粤曲的形式进行宣传。

另外一个荷塘群众抗日救亡团体，是“流动剧团荷塘分团”。在“七七”事变前（一九三六年），共产党在江会地区重建组织，大力地推动各种秘密抗日活动、特别是在进步教师和青年学生中，发展较快，如县城方面组织起“春天读书会”、“咱们鼎社”、“青霄御侮救亡工作团”、“妇女抗敌同志会”、“流动剧团”等等。那时荷塘最大的一间学校三良学校的进步师生也组织起“新会流动剧团”的荷塘分

团。这间学校校务主任容子聘，是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毕业，为人思想开明，爱国爱乡，他吸收了一批进步青年在校任教，如容汉勋、崔润华、容焕章等，从平津流亡到南方的青年作家吴家盛，也寄寓在三良学校。这些人有的不是荷塘人，他们是在广州读书时相识，“七七”事变后，这些人是为了抗日救亡，走在一起的。初时只利用三良留穗校友会和篁湾的建勋留穗校友会中的体育爱好者之间的友谊，开展一些体育比赛，在知识青年中打破过去氏族历史积怨的隔阂。到了会城的知识青年在党的指导下组织起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团体时，以容焕章为分团长成立了“流动剧团荷塘分团”。这个剧团除了演出鲁迅艺术学院以抗日为题材的话剧之外，还有于头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活报剧，并在良村市设立黑板报，每天摘录重要时事新闻报导，每十天出一期墙报，结合当地情况写出各种形式文章、漫画宣传抗战，和介绍防空常识，救护常识，内容生动活泼，很受群众欢迎。不少知识青年到三良学校要求参加剧团活动，许多爱国群众主动捐助经费纸张，大力支持。无形中，三良学校就成了荷塘群众抗日活动的大本营。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江、会紧张，这时保卫家乡的口号，每个热血青年都从心底呼唤出来，要求建立新会青年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省的组织成立之后，不久中共新会县工委也通过深入的统战工作，用公开合法的形式，筹建“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新会总队”，以国民党新会特派员李淞甫兼任总队长，吕十（共产党员）任付总队长。跟着荷塘也成立“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新会县第四区队”，（简称抗先队，区队部设于南良秋祖祠），以刘良（是当地党组织负责人的假名）任区队长，容焕章任付

区队长。区队之下设中队、小队、班的组织，差不多象军队一样。由于新会抗先队是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是在烽火燃眉的“保卫新会”口号下组织起来，荷塘抗先队针对荷塘的复杂形势，也提出“团结抗日保家乡”的口号。除了团结全乡进步青年纳入抗先队的组织，继续动员群众，准备迎接战斗以外，同时要设立交通站、情报网、撤退站等等的实际工作，更要紧的是争取乡上层人士的支持和各方面的武装部队的合作。抗先队尽管成立较迟，但荷塘抗先队的领导人早已在乡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有了群众基础，不过这时有了这个类似武装体制的公开合法组织，工作更加便利而已。地下党是以“抗先队”的名义联系乡中的上层人物，争取他们的支持，布置进行实战的准备工作，无形中成了荷塘武装抗日参谋部和指挥部了。

以上三个组织都属于群众性质的抗日救亡团体。“抗先队”当时也没有战斗的实力。当时国民党政府最基层的武装力量，是各乡素来有的所谓自卫队。抗日军兴，国民党政府为了加强控制地方武装力量，统一军事体制，一九三七年秋县长李务滋也指令各乡自卫队改称为民众抗日自卫队，荷塘的称为“民众抗日自卫队新会第四大队”，（以下简称抗四大队）例由当地区乡长兼队长。荷塘那时在县的行政上属新会第四区，正乡长为李子瑜，副乡长容寿吾。但过去乡间所设自卫队武装，都是“更夫”、“沙夫”之流，他们手上虽拿着枪杆，领到薪饷，（由各村自筹自给）却从来没有正式受过军事训练，这时突然要成立抗四大队，县长定期声称亲临检阅。李子瑜、容寿吾只得把各处“更夫”、“沙夫”调来，人员不足，临时找一些农民凑数，李、容两人也不得不穿上军服，“立正”“敬礼”。经过这次检阅之后，六十多岁的李子

瑜认为这样干下去是吃不消的，乡长难当。他的族弟李启颐就乘机向他推荐容骏林当抗四大队队长，他一口答应了。容骏林是老牌的保定军校毕业的与李启颐同学，只是染上鸦片烟瘾，为人吊儿郎当，干事不负责任，在军界上爬不上去，但他是东良容族长房的人，因此，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同时以西良二房容仲舆为副队长，照顾了东西良和长、二两大强房。所以经费虽然由容氏全部负担，而容氏却没有人敢于起来反对。大队部设于良村市中心——“万宝朝堂”照壁对面勉斋祖祠。经费是从良村市的烟赌收规中支拨。各村也照例挂个中队的虚名。即使是篁湾这样的大村，也只报了一本花名册就说已经成立中队了，至于人数多少，有无训练，容骏林从来是不过问的，范德星、李启颐更不闻不问。其他各村也是找些更夫、沙夫来充门面。

到了一九三八年冬季，荷塘的武装组织除了“抗四大队”外，又成立了一个“新会县第四区民众抗日自卫队第二独立中队”（以下简称独二中队）的武装组织。原来荷塘以容姓最多，主要分居东良、西良、南良三处，合称叫做三良，在封建社会里，他们本族之间也有不少矛盾，而抗四大队各级的队长，容姓的人虽占不少，只是东良一些有家子弟挂名充当。加以大队长容骏林做事不认真，队务松懈。早引起了南良大绅容敬棠、容友长的不满。这时荷塘“抗先队”已先成立，为要掌握武装，抗先的领导人员就拉了他们和西良的大绅容寿吾（兼副乡长）、容惠之、容子聘等商量，认为必要建立有战斗力有决心保卫家乡的队伍，但改组抗四大队已不可能，打进去也不容易，因为容骏林资格老，又得篁湾方面的支持，而下面的职位已给东良人占据了。于是由西良南良几位大绅呈报县府成立这个独立二中队。捧出容天池